



中俄共對立下環繞外蒙的三角關係

·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二十一 ·

著 李毓澍

· 蒙藏委員會印 ·

中俄共對立下環繞外蒙的三角關係

目 錄

(一) 前言·····	一
(二) 外蒙尋求真正自治自主的失敗·····	三
(三) 中共對外蒙關係的積極展開·····	一九
(四) 中俄共交惡後外蒙的因應·····	三〇
(五) 中俄共關係解凍中外蒙的矛盾·····	四六
(六) 結論·····	五四

本資料純屬個人學術
研究性質僅供參考

中俄共對立下環繞外蒙的三角關係

(一) 前言

外蒙古毗鄰俄屬西伯利亞，幅員廣濶，居民稀少，而地下資源則蘊藏豐富，地理位置又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故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即成為俄人南侵覬覦的目標。

一八九二年俄人宣布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顯示代表陸權俄國勢力積極向太平洋伸張，促使日本提前發動中日甲午戰爭^①。戰後俄以援助對抗日本為餌，誘騙中國與其訂立密約，得將東段西伯利亞鐵路，貫穿我黑吉兩省，繼而強租旅順大連，修築由哈爾濱至旅大支路，遂將我東北三省一舉置於囊括之中^②。俄人急遽的擴張，破壞了遠東的均勢，刺激了海權英國的對抗，於是一九〇二年有英日同盟的訂定，促成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

此次戰爭之後，俄人席捲我東北之勢受挫，變為日俄在東北平分秋色。繼而兩個敵對國家，竟在協謀侵略中國的共同利益前題下勾結，是以有一九〇七年的日俄第一次密約，約文中定明：「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之特殊利益，並擔任禁

制可以妨害此種利益之任何干涉」。(第二條)俄人圖我外蒙愈見積極，辛亥(一九一一年)年間外蒙古所謂獨立，實係此一國際背景所造成。

方俄人一手製造外蒙「獨立」之際，日本趁機提出向西延伸南北滿界線並劃分東西內蒙古之議，乃有一九一二年日俄訂結的第三次密約，約文中除延伸南北滿界大致沿黑龍江與內蒙界一直到內外蒙界，並依據穿越北京之經度一百一十二度二十七分，劃內蒙古為東西兩部份，日俄相互承諾尊重對方在東西內蒙古的特殊利益^③。大體上，所謂東四盟除錫林果勒盟一部份外，盡在日俄私自劃分的東部內蒙古範圍，此亦俄人宰制外蒙，對日本所作出的讓步。

時值民國肇造，北京政府謀以外交談判，對外蒙局勢有所挽救。經多方折衝，俄因在歐洲多事與本國最大利益的雙重考慮，始允許中國保證「不派兵、不設官、不移民」的前題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有宗主權。而中國則承認俄蒙私約中蒙人許給俄人的全部經濟利益，並承認未來俄對外蒙事務有干預之權，換取俄對我有外蒙古主權的承認，此即一九一三年所簽署的中俄聲明文件及另件^④。自此，外蒙古乃由「獨立」一變而為「自治」。

稍後歷經歐戰與俄國十月革命兩巨變，俄人在遠東勢力衰退，一九一九年我

國始獲得恢復外蒙古完全主權的機會，乃有外蒙官府主動向北京中央政府請求取消自治之一幕。可惜北京軍閥應付不當，專橫濫權，剛愎自用，嚴重傷害了蒙胞內嚮之心。於是日本首先於一九二〇年想利用白黨恩琴 R. Von Ungern Sternberg，侵佔外蒙，遞補俄勢退出後的空檔，旋又受歐戰結束後國際協調政策的牽制，更因美國即將召集華盛頓會議，清算歐戰期間日本在遠東迅速擴張所新獲得的權益，日本遂不得已而縮手。恩琴雖攻陷庫倫，製造蒙古帝國，終注定曇花一現的命運。至是赤俄乃趁機利用少數渴望掙脫北京軍閥與恩琴統治的蒙人作嚮導，出兵攻陷庫倫，製造了外蒙第三次的獨立政權^⑤。從此，國際上出現俄共第一個衛星國家。蒙人尋求真正自主自治的幼稚願望，也陷入俄共陰狠奸詐的束縛，難以自拔。

(二) 外蒙尋求真正自治自主的失敗

早在一九一一年外蒙古所謂第一次獨立時期，就想聯合內蒙古、呼倫貝爾共同組織「大蒙古國」。是時內蒙古烏泰、海山與陶什陶等人，都來庫倫投效^⑥，呼倫貝爾副都統勝福等並已歸順外蒙，並接受庫倫的封爵^⑦。俄人則顧忌南侵內

蒙，勢不免與日人發生衝突⑧，因此在民國元、二（一九一二—一三）年之交，肯資助外蒙西向陷科布多，侵及阿爾泰烏梁海，東向南犯內蒙，則特別謹慎，甚至壓抑外蒙部份過激的主張。至於呼倫貝爾，俄人為中東鐵路的利益，允諾支持其變象獨立，但堅拒雙方合併的要求⑨。這對早期蒙人的民族運動是一個打擊。

俄國革命後，紅白兩黨在西伯利亞爭逐，布里雅特人謝未諾夫 Semenov 所率白黨，在西伯利亞作戰失利，頗思利用蒙古民族運動，作擴張勢力之計。恰值美國總統威爾遜之 Wilson 於一九一八年揭櫫其十四點，為處理結束歐戰的原則，一時民族自決，極為風靡。日本乃圖利用謝未諾夫，煽動內外蒙古呼倫貝爾與布里雅特合組政府，遂有「大烏里會議」的召集，並在海拉爾建立政府⑩。當時國際上所謂「泛蒙運動」，實由日人暗中操縱指揮⑪。

謝氏脅迫外蒙參加海拉爾的臨時政府，外蒙鑑有日本幕後主使，深懷疑懼，又恐力不能拒，乃願與庫倫都護使陳毅磋商條件，撤銷自治，仍歸附中國。外蒙所希望商定的條件，即保留既有的自治權利⑫。徐樹錚遽以兵力脅逼撤治，繼而西北籌邊使署遷庫辦公，將外蒙自治官府五部悉數歸併⑬。更令蒙人倍增河山易色，不勝今昔之痛。

於是自一九二〇年起，外蒙秘遣代表，多以私人身份活動，各方聯絡俄國紅、白兩黨。連向日最為疑懼的日本；也成為求援的對象，這正是飢不擇食的決定^⑭。一九二〇年白黨恩琴的入犯，一九二一年引導蘇俄紅軍陷庫倫，實皆導源於此。

從蒙古人民黨（蒙共）創立最早的文獻來看，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制定「黨的誓詞」，就揭出「黨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肅清國內兇惡的敵人，鞏固國家，百折不撓的保衛蒙古民族」^⑮。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所定的黨綱，其第二條：「蒙古人民黨規定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蒙古人民獨立的國家，黨的最近目的，是要使蒙古脫離中國軍閥、俄國白黨的統治。恢復不久以前被破壞的外蒙古自治」^⑯。這兩個文件都表現着蒙人的民族主義。黨綱中又鄭重聲明，「每個蒙古人，凡是承認黨的黨綱，服從黨的規章，黨都接受他，參加自己的隊伍」。更是利用民族主義統一陣線，壯大蒙古人民黨的勢力。

出席蒙古人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成員，共有二十六人，屬於布里雅特蒙古的三人，包括黨綱起草人詹沙倫諾 Gamtsarano。俄國三人，包括第三國際代表波雷索夫 Borisov 與軍事代表布里烏爾克 Blyhark。來自喀爾喀四部的只有二十

人^{①⑦}。在討論政綱時，代表中明顯分為兩派，一派以波雷索夫為首，喬巴山與蘇赫巴圖附和之。主張與俄共加強聯繫，緊密合作。一派以詹沙倫諾為首，鮑道、鄧桑、彭楚克多爾濟等附和之。主張蒙古獨立建國，仍奉哲布尊丹巴為元首，與蘇聯維持友好關係。後者佔大多數，他們的主張遂成為起草蒙古人民黨政綱的基本原則^{①⑧}。這也說明蒙古人民黨創立伊始，是走的民族主義統一路線。只是選錯了夥伴，誤信俄共辭卑言甘的陷阱以後，即難掙開鎖枷。日後一次次血腥的整肅，屠戮了多少忠於蒙古民族獨立運動的志士，才造成完全聽命蘇俄的喬巴山獨裁。

在整肅殺戮的過程中，俄共還有一個重要的工具，就是「蒙古革命青年團」（簡稱共青團）。它是由一群在恩琴統治時期逃往俄境的蒙古青年所組成，經第三國際收容養，並施予嚴格的訓練^{①⑨}。這些血氣方剛的年青團員，遣回本國後，更能認真執行由俄共隱在幕後所交付的任務。

在一連串殺戮蒙古民族主義者的整肅中，第一批遇難者是一九二二年的鮑道波道。及其同黨十四人。外蒙政府科學委員會同蘇聯科學院專家所撰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以下簡稱「通史」），指稱這次是階級鬥爭中最尖銳的表現之一，鮑道也是革命最兇惡的敵人之一^{②⑩}。

事實上鮑道是蒙古人民黨創始人之一，是一位熱心政治，效忠民族主義的平民喇嘛。一九二〇年蒙古革命黨人在伊爾庫次克會商後，他負責潛回庫倫，觀察動靜，擔任聯絡工作。蒙古人民黨成立大會上，他是二十個蒙人之一。臨時政府在恰克圖成立時，他擔任外交部長。正式政府在庫倫組織，他出任國務總理。他執政的政策，極力主張全蒙力量一致對外，謀求外蒙的獨立，對內則採漸進的改革。這也是他被整肅的癥結。平情而論，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實在就是反抗蘇聯控制的自由鬥士。

蒙古政府宣布鮑道等的罪狀，先誣指他歸附革命組織的動機，是為了驅逐影響沙畢衙門（寺院牧民的管理機關）收入的佔領者。他執政的措施，走上了進行挑撥的道路，企圖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的不滿。一九二二年鮑道與上層喇嘛，過去恩琴份子，以及在科布多地區的丹比贊桑等人建立聯繫，把一切反「人民」的勢力集結成一個反革命組織。他依靠這個組織，並與日本及軍閥張作霖建立了聯繫，積極準備發動一次政變。八月七日「陰謀」敗露了，鮑道和他的同黨遭到逮捕，提交法院審問後，鮑道、察克都爾札布、彭楚克多爾濟等高級黨政領導階層一十五人，都被判處死刑。同年底，也消滅了丹比贊桑結合的地方力

俄共鑒於蒙古內部思想上的衝突相當尖銳，為加強鎮壓和制裁起見，於同年七月建議蒙古設置「國家內防處」，後來改為「內務部」。這個情治機構即由喬巴山掌握。同時俄共的政治保衛局，也在庫倫協助內防處的整肅工作^{②2}。這一些都有助推動喬巴山消除異己登上獨裁的座位。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蘇赫巴圖暴斃，據後來宣布鄧桑 Danzan 的罪狀，誣陷是鄧氏用毒藥害死他的。鄧桑是蘇赫巴圖革命小組的成員，也是蒙古人民黨創始人之一。當初赴莫斯科求援的代表中，他是三人小組的首席，會晤過列寧、史大林等。臨時政府時他擔任過財政部長。一九二二年出任軍政部長和副總理。被處死前是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也是蒙古革命軍的總司令^{②3}。

當一九二三年七月，蒙古人民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據蒙共宣稱：以鄧桑為首的反革命勢力，曾竭力阻撓黨代表大會的召開，主要的原因，是他反對地方自治，清除王公札薩克在地方上傳統的權力。鄧桑等認為，這將是從基礎上改變蒙古的社會組織。七月十八日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仍照預定召開，會中通過了地方民主自治和召集全民代表的大呼拉爾會議。在中央和地方的機構中，都吸收了

牧民的代表參與⁽²⁴⁾。

蒙古人民政府依據黨的決議，同年十二月五日制定了一個條例，廢除了領地王公子子孫孫世襲占有旗的土地，牧場和牧奴的特權。規定封建主雖可被選為旗代表，但不得本旗牧民的同意，無權管理旗務。旗札薩克要向旗代表會議負責。旗代表會議並有權解除札薩克的職務，另選新札薩克，祇須事後呈報政府批准⁽²⁵⁾。

從一九二三年冬到第二年夏，外蒙廣泛地展開地方行政機構的選舉活動，各級牧民或代表大會的召開，選出了「十戶」、「巴嘎」、「蘇木」、「和順」和「艾馬克」各級地方行政機關。「通史」中特別指出這些選舉，都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之下進行的⁽²⁶⁾。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逝世了，外蒙政府立即接收了他的印信。兩個星期後，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實施共和政體的決議。宣布鄧桑的罪狀中有一條是他主張「君主立憲」⁽²⁷⁾。

八月四日蒙古人民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鄧桑以中央委員會主席致開幕詞，他提出蒙古人的心聲——希望是真正的獨立。這震驚了俄共的觀察員，也立刻遭遇到共青團猛烈的攻擊，在致詞後不久，就以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與所謂同謀者

都被逮捕，並立即處決^⑳。

其實鄧桑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由色彩的人士，他為着尋求蒙古的獨立建國，抵制俄共處處在幕後操縱，想重新恢復與中國的關係。這是最遭第三國際的忌，他被誣為日本間諜，應是莫須有的罪。在當時外蒙經濟發展的方向上，他也是主張走非共產制度路線的代表，因此，蒙共宣布他的罪狀內有一款，指明他是革命的資產階級^㉑。

蒙古政治的共產化，歷經了近十年，激烈的左派，卻來自黨外的共青團，黨內則仍不免受年長且較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所支配，團與黨遂展開爭取國家領導權的衝突。一九二三年共青團第二屆大會，公開宣布「它在組織上和政治事務上，完全離開黨而獨立」。在第三國際透過喬巴山的指揮下，甘心充當對付民族主義份子的殺手。

黨內保守的民族主義者一直幼稚的想尋求真正的獨立，政策上走溫和路線，不想與蘇聯過分親近。保守派的發言人澤彬 J. Tsebeer，就曾說過「蒙古須成為瑞士一樣的中立國」一類的話^㉒，這豈是已入俄共魔掌輕易實現的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保守派領袖當時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丹巴多爾濟 Damba Dorji 又遭到整肅，他被剝奪一切權力，送往莫斯科，四年後就客死在那裡。被誣為反革命罪嫌的同謀者，則一律處死^{③①}。在這次黨的大會中，也決定了團壓倒黨的新形勢，激進派在陸軍指揮官和團領袖喬巴山的指揮，於四十八天漫長的會議中，成功的驅逐了保守派，屠殺了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份子。喬巴山終於奪得了黨的全部權力^{③②}。

從庫倫活佛的去世，蒙古政府接管印信後，就決定斬斷傳統方式尋覓呼畢勒罕，從此蒙古的神權政治消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制定的新憲法，緒言中特別敘明活佛的印信，交與政府保管，全部權力移給大人民呼拉爾及會議所選出的政府。正式宣布蒙古是一個完全的人民共和國^{③③}。庫倫也同時更名為「烏蘭巴托」，蒙古人民黨也同時變成了「蒙古人民革命黨」^{③④}。

本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蘇俄外交政策相當集中於中國事件，莫斯科希望早日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也希望利用中國澎湃的民族主義，煽起一場共產革命。為了避免與中國公然為敵，又不願失去對外蒙古的實際控制，假手共青團清除蒙古民族主義派的領導人士，輔助甘為傀儡的喬巴山登上權力的頂峯，正出於這項基本的客觀背景。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終於和北京政府簽定了協約

大綱，同時又使外蒙乘活佛的死，制定了憲法，建立一個形式上的人民共和國。蘇俄的外交委員會宣稱：「本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但也認為蒙古不僅在內政上與中國無關，而且能獨立實行其外交政策」^{③⑤}，仍是詭詐的兩面手法，愚弄世人。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是外蒙國內政策走向極端偏左政策的預備階段。外蒙的新政府，在第三國際與蘇俄格別烏的指揮下，開始鞏固它們依然脆弱的地位，暗中破壞蒙古人民革命黨中的右派份子，並攻擊統治蒙古數世紀之久的兩大勢力，首先是貴族，其次是寺院的堪布大喇嘛。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左派份子與右派份子間決定性的衝突，就發生在前已敘述一九二八年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經過四十八天激烈的爭辯，右派份子被逐出黨外，左派份子完全奪得黨與政府的控制權。對於決定重要政策目標，左派份子就利用奪來的最高權力，左右黨的輿論，加速推行其計劃。此刻，在俄國戰勝政敵的史大林，保證給與蒙共中偏激左派者堅強的支持。同時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國民黨已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並在南京鞏固其政權，蘇俄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無需再謹慎小心，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都使蒙共左派份子易於走上冒險激進的路線^{③⑥}。

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之後，外蒙當局宣布新政策，經過大人民呼拉爾形式上通過實施。左派激進份子要求立刻將封建財產充公，全力實行五年計劃。將畜牧業集體化，排斥中國商業。這些措施實際是奉行史大林的決策，也是蘇聯當時所信奉的經濟思想，根本毫未考慮到蒙古粗放遊牧生產的社會狀況。

蒙古當時的社會情況，絕大多數的人民是文盲，根本沒有所謂工人階級，散布在遼濶草原的，多是小型個人的放牧。貴族和寺院的產業，雖占全國財富的大部份，但民衆仍普遍服從傳統的權威。在如此條件下，蒙共所執行的新政策，就無法獲得廣泛的支持。政府又缺乏週全的布署和經驗，唯莫斯科之命令是從，必然會給蒙古人民帶來重大的災禍³⁷。而中國商業被排斥，形成蘇俄貿易的壟斷，更加深了莫斯科對外蒙古的經濟控制。從輸出統計看，一九二三至二四年，輸往蘇俄的牲畜及其產品，約佔外蒙總生產量七分之一。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就激升到佔百分之八五·五³⁸。由蘇俄輸入的，一九二九年祇佔消費品的半數，蒙古的輸入量遠低於輸出量，就造成嚴重的商品荒，也帶給人民生活上不便和痛苦，自是不言可喻的。這個年代的蘇俄，正在戰亂後廢墟上建設自己的國家，實在也無援助衛星國多餘的能力。

一九二九年外蒙開始嚴厲的鎮壓反對派，在喬巴山的命令下，六百餘家封建主的財產和牲畜，被充公分配給牧民及還俗的貧困喇嘛。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又強奪了八百三十七名王公和大喇嘛的私有財產，同時七百多家的戶長遭到殺戮和監禁。反宗教的運動分為三個層次，對於下層喇嘛強迫其還俗，加入軍隊或從事生產行列。對於中級喇嘛，則送入集中營改造。對於高級宗教領袖，則予以清算和殺戮^{③9}。

緊接沒收封建主等私有財產之後，就是推行集體化——一種牧民的共產公社制度，當年就有全蒙古三分之一以上的畜牧者，被迫接受了集體化^{④0}。對蒙古牧民殘暴的集體化工作，進行的太急，引起了流血的反抗。可是貫徹莫斯科的指示，依然不得不加緊進行。更為了掩飾決策的錯誤，蒙共展開一系列的宣傳，貴族、喇嘛、頑固牧民及民族主義者，都成為指摘或誣控的對象。同時也整肅黨內各階層幹部，使成為替罪的羔羊。

一九三〇年春召開的蒙共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不僅未對冒險激進政策檢討改進，反對這些偏激行動給予理論上的基礎，更決議要在五年計劃完成時，使貧牧百分之七五以上，中牧百分之五十以上集體化^{④1}。又為了達到商品的生產經濟，

成立了六個大型的農作和畜牧國營牧場⁽⁴²⁾。

同時為防止資本主義的發生，對於尚處在幼稚狀況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也禁止私營，強迫工匠加入阿特爾（Artels）——生產合作社。並採用累進稅率對付私營工商業，沉重的稅捐，使僅存的工商業統統消滅，結果使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為全國各地唯一的購買者和販賣者⁽⁴³⁾。

據外蒙官方宣布的資料，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間，成立了大約四百個集體牧場，納入的成員多達四萬三千人。這些集體牧場中並有一百五十二個公社，為了領導和管理集體牧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還特別設立了「全國集體牧場中央管理處」。⁽⁴⁴⁾

過激的冒進政策，造成蒙民的大災難，憤怒和恐怖的牧民，消極的從事反抗，在三年中就屠宰了七百多萬頭牲畜，約當全國畜量的一半。使主要依賴獸力耕作的農業，也連帶遭到破壞。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成千成萬的人受到食物匱乏的痛苦和日用必需品的奇缺，將國家帶到內戰的邊緣。蒙共不得不乞請俄國調派軍隊，出動坦克車，來鎮壓日趨蔓延的變亂⁽⁴⁵⁾。

由於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據了東北，兩年間日本關東軍

就推進到外蒙古的邊境。日本威脅的加深，使史大林考慮到外蒙的混亂，會給日本製造干預的機會，才透過第三國際，指揮蒙共，立即停止這種冒險激進政策。至是蒙共才承認這次造成災難的原因，是實行集體化。一項大改革，須先運用宣導說服，或再教育的方式，才能推行，不是可以武力強制的。蒙古基本上落後的條件，尤不能遽予執行。喬巴山更宣稱：「我們的國家全面發展，尚未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而每一件事都抄襲蘇俄的經驗，也是一項錯誤」。(46)真正這錯誤的責任，實應由俄共頭子史大林來負。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小呼拉爾出面，發表了告阿拉特人民書，宣布不再干涉私人的經濟發展，解散集體牧場和農場，協助個人增加生產，廢除對畜牧工商業所施行的累進稅制，禁止對宗教的歧視和迫害，才將燎原的戰火緩和下來(47)。

從一九三二年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一九五〇年，蒙共大體施行社會經濟漸進主義的新政策，這是冒險激進後的修正路線，決定這新政策的仍是蒙共幕後主宰史大林，他也完全基於蘇俄的利益而定。蘇俄要保住外蒙古，成為對付中國或日本的緩衝，尤其是面對擴張主義的日本。在這期間的初期，甚至不肯開發蒙古的資源和工業，以免誘發日本的侵略。何況蒙古只生產原料，正可有益於蘇

俄的經濟力量。但是一支以騎兵為主的軍隊，用來防衛外蒙，並協助蘇聯抵禦外力入侵，則是需要的^{④⑧}。於是在蘇俄的協助下，外蒙建立了一支八萬到十萬的軍隊，在不滿一百萬人口中佔了百分之十。維持這支軍隊，消耗了蒙古國家半數以上的預算^{④⑨}，遂迫使蘇聯不得不稍施與經濟援助。

當日本關東軍試探外蒙東面邊境實力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蘇俄與外蒙簽定了一項秘密協定。翌年元月俄軍再進駐外蒙。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蒙更正式簽署了為期十年的「軍事互助協定」。這個協定不再提中國對外蒙的主權，莫斯科也不理會來自南京的兩次抗議^{⑤⑩}。

一九三九年八月，蒙軍配合俄軍，在東部邊境哈勒欣河旁，與日本打了一場硬仗，重創了日本關東軍，這就是日人所稱的「諾門罕事件」。從此日本不再向蒙邊挑釁。六年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外蒙反追隨蘇俄向日本宣戰，輕易的檢獲了戰勝的果實。

由於喬巴山一直遵行史大林的命令不渝，德蘇戰爭期間，又能搜集牲畜與原料，接濟蘇聯，竭智効忠，故能長保權位而不墜。經過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第八屆大呼拉爾會議，所制定的一九四〇年新憲法，是喬巴山在外蒙掌權的最高峯，

這個憲法也被稱為喬巴山憲法^{⑤1}。

一九三〇年代全期，蒙古人民革命黨並未因保守派領袖的整肅，而停止了內部權力鬥爭。最初參加革命的首要份子，只有喬巴山一人仍繼續在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團和書記處。一九三〇年到三四年，各階層都在反右反左下整肅，凡是稍有民族主義色彩的都被誅除。蒙共的黨員人數，一九三二年為四萬二千人，一九三四年就只剩了七千九百七十六人，屠戮了五分之四以上。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〇年期間，每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減少到兩次，大會的會期也縮短了，一切的決策，都集中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政治局，喬巴山漸漸依照史大林統治俄國共產黨的模式，來領導蒙古人民革命黨^{⑤2}。

一九三七年八月，總理甘登 Gendun 被處決，一九三九年三月，繼甘登為總理的阿穆爾 Amur 又被處死，在這些殘暴的權力鬥爭中，許多黨的幹部和政府的官員，都受到清算和迫害，喬巴山終於從幕後走上前台，接替總理的職務，從心所欲的掌管着政權。從一九四一年到五二年他的死，他受到他甘願服從的俄酋大力支持，在外蒙古他的話就是法律。他死後數年，蒙人譴責他搞「個人崇拜」，像鞭史大林屍一樣的清算他，這是一個很確當的定評^{⑤3}。

(三)中共對外蒙關係的積極展開

外蒙自一九二一年由蘇俄入侵，製造「獨立」以來，一直在俄共的嚴密控制之下^{⑤4}。在與中共建交以前，與外蒙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只有北韓（一九四八年十月建交）與阿爾巴尼亞（一九四九年五月建交），與這兩個國家建交，在實質上並無意義。可以說外蒙對外關係就是對蘇關係——一種主與奴或父與子的關係。從國際上來看，根本是被蘇俄完全隔絕和封閉的。這種情況對於內心渴望追求真正獨立，渴望加強與外界聯繫的外蒙來說，自然是不會滿足的。因此，在中共竊據大陸，建立偽政權之後，外蒙就一心想加強與中共的關係，引進中共的勢力，以與蘇俄在外蒙的勢力相制衡。更希望經由中共，獲得更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

先是中共建立其政權前，外蒙和中共已有軍事方面的關係，這是由蘇俄所主持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喬巴山和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布馬正德 *Bumatsrende* 應史大林密召，赴莫斯科會晤朱德等，商談蘇俄、中共與外蒙三方面軍事、政治、經濟共同聯繫事宜，外蒙曾在蘇俄指揮下，協助或配合中共叛亂的軍事行動^{⑤5}。

中共政權建立後，外蒙迅速與中共建交，一九五〇年七月，雙方首任大使賈

爾卡賽汗 Jargal sai khan 與吉雅泰即分赴北京與烏蘭巴托履新⁵⁶。韓戰期間，在蘇俄指使下，雙方於一九五一年秋簽定「軍事互助協定」，共同組織聯合防務委員會，聯合防禦總部，聯合訓練中心及聯合情報局⁵⁷。

喬巴山的死，中共派團前往祭吊，由聶榮臻和王震分任正副團長。經過蘇俄的仲介，在烏蘭巴托與外蒙方面展開訂約的談判。後來移到北京續議，終於一九五二年七月，由中共外次伍修權與外蒙大使賈爾卡賽汗談判完畢，雙方達成協議。九月，由外蒙總理澤登巴爾率龐大代表團前來中國大陸訪問。十月四日正式簽訂為期十年的「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首先恢復了中國大陸和外蒙中斷二十餘年的貿易關係，也轉變了蘇俄在外蒙商務上的獨佔形勢⁵⁸。

先這次簽約一個月，蘇俄曾召中共和外蒙集商，九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商定一件有關鐵路交通的協定。三方面同意在一九五五年之前，興建完成由烏蘭巴托至集寧的鐵路幹線。這個鐵路興建計劃與中共和外蒙新訂經濟文化合作正相配合。有關這條鐵路的聯合公報，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公報上說明，從集寧經二連到中共邊境的鐵路，由中共負責修築。從烏蘭巴托經扎木烏特到外蒙邊境的鐵路，由蘇聯與外蒙共同負責興修。全路段修築完竣後，將與烏蘭巴

托到蘇聯的鐵路連接^{⑤9}。

中共負責的集寧二連段，自一九五三年五月動工興修，動員工人多達二萬五千人。次年十二月十一日修建完成，全長三三七公里。這是中國境內當時唯一採用俄式寬軌的鐵路^{⑥0}。整條鐵路於一九五六年元旦，由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剪綵後通車^{⑥1}。

這條鐵路的通車，對蘇聯、中共和外蒙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對蘇聯來說，縮短了由莫斯科到北京的鐵路距離，減少了貨物的運費和時間，在軍事上也正隱藏着蘇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尤其是對內蒙古。就中共而言，這是加強對外蒙關係的重要管道，貨物和勞工都將經由這條鐵路湧進外蒙。從外蒙來說，鐵路貫穿庫倫以南廣闊草原，沿路各地獲得有利的開發和利用，經由這條鐵路，與外界有更多的接觸，對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都有深遠的影響。

從中共與外蒙簽訂經濟合作，到鐵路通車的第一年，最明顯表示出的是貿易額的增加，若以一九五二年貿易額為基數一〇〇來比較：

一九五二年	一〇〇	一九五三年	六八五
一九五四年	一〇七〇	一九五五年	一四八八

⑥2

一九五六年 三八三二 一九五七年 五〇九五

二二

五年之間，貿易額增加了五〇倍，鐵路暢通後貿易額的飛快成長，自可想見。

一九五三年史大林的死，造成蘇俄領導群的奪權鬥爭，直到一九五八年赫魯雪夫才穩固住他的領導權，這五年擾攘期間，對外蒙的控制不免稍為放鬆，中共也利用這大好機會，積極擴張對外蒙的影響力。

據云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與布加寧 Bulganin 來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偽國慶時，毛澤東曾提出要求，希望蘇俄尊重外蒙的獨立，放鬆對外蒙的控制，當時並未得到結果。這事直到十年後，毛澤東才向一群訪問北京的日本社會主義份子透露⁶³。此事公開後，蘇俄發表談話，暗示當時中共要求合併外蒙，赫魯雪夫當然拒絕討論此事⁶³，雙方各執一詞。

經過上述的一度交手，使蘇俄和中共都能窺測到對方外蒙政策的意向，於是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內，雙方展開了爭取外蒙的拔河。

中共為爭取外蒙人民的好感，採取了許多迎合蒙人民族感情的措施，也藉此製造蘇俄控制外蒙的困擾。一九五四年成吉思汗逝世七二七年紀念日時，中共在內蒙集會紀念，並決定重葬大汗的靈柩於蒙人傳統的聖地——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

。內蒙首領烏蘭夫大肆讚揚中共和毛澤東對少數民族的關注和照顧。一九五五年成吉思汗的新陵寢落成⁶⁵，中共對這位蒙古族中震盪古今的大人物，崇敬與宣揚，正有它統戰的多重運用。

更為了表示重視蒙古，加強對蒙古的研究，在中共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中，特設有「蒙古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和呼和浩特（歸綏、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內蒙古大學，都特別重視此項研究。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呼和浩特舉行一次會議，宣布內蒙也將比照外蒙，採用俄文希利里克字母 Cyrillic Alphabet 書寫蒙古文字，以加強兩者之間的文化合作⁶⁶。是年十月，蘇俄中共和外蒙的學者在烏蘭巴托舉行十天的學術會議，會中還決定由三方面合撰一套外蒙歷史，這計劃訂在一九六五年完成出版。雖然改用希利里克字母拼寫蒙文及合撰蒙古史的計劃，因為中俄共關係的變化，中共都未履行⁶⁷，但提出或參與計劃的當時，自不免帶有博取外蒙好感之意。

中共對待境內的蒙人，尤其是內蒙的態度，也必然會影響到外蒙對中共的觀感，所以中共在這方面特別注意。每遇與外蒙接洽來往，儘量派用蒙古人。中共首任駐外蒙大使吉雅泰，就是蒙古人。烏蘭夫更是蒙人治蒙最佳的例證。他擔任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主席，高居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策地位。他主持中蒙鐵路通車典禮，曾率團參加蒙共第十二（一九五四年）第十三（一九五八年）多次代表大會。這都是俄境布里雅特等蒙人，從來無法擔任的職位。自然在外蒙人的心目中，贏得較高的評價。

除上述迎合蒙人民族情感外，更大力對外蒙提供了經濟和人力的援助，這對爭取外蒙更發揮具體的功效。外蒙經過一九四〇年新憲法後，傳統的社會已全改變，當前外蒙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加強經濟發展，提升工業化的層次，改善人民生活的品質。尤其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由於支援蘇俄，經濟上遭受嚴重的傷害，現在要進行經濟發展計劃，就必須爭取到大量的外援。

在中共大量援助外蒙以前，外蒙的外援都來自蘇聯，但蘇俄的援助是想控制外蒙，並非提升外蒙經濟的層次。所以一旦在經濟上控制住外蒙，對外蒙的援助並不積極，數量也很有限。一九五二年前，在經濟方面，僅協助外蒙建立了幾個小型企業：如酒廠、皮革廠、罐頭廠等。開發地下資源方面，也只有一個煤礦而已⁽⁶⁸⁾。直到中共的勢力伸入外蒙，眼見到中共與外蒙的關係日益親密，為了繼續保有對外蒙的控制權，才開始大量對外蒙提供援助。因此，外蒙加強與中共的關

係，實是一舉兩得，不但得到中共的援助，而且迫使蘇聯擴大對它的援助。

在勞動力的援助方面，中共和外蒙於一九五五簽署協定，由中國大陸派遣華工赴外蒙工作，薪給和工程的材料費，則由中共贈與或貸給外蒙的款項中支付。中共所派首批華工，於一九五五年五月抵達外蒙，這年夏季約達一千人。嗣後一批批派往，到翌年八月就多達一萬人。一九五八年又有二、四〇〇名華工派往。一九六〇年九月，中共再與外蒙締結新協定，繼續提供華工，條件是華工可以取得外蒙的永久居留權及公民權⁶⁹。這個條件自然含有政治意義，但外蒙由於勞動力的缺乏，華工的服務品質又佳，也欣然接受了。到一九六〇年，在外蒙的華工約兩萬人⁷⁰。

在款項的援助方面，中共於一九五六年的協定中，贈與外蒙一億六千萬圖格里克（蒙幣名，當時約與盧布等值），協助外蒙建立紡織廠、造紙廠、合板廠和玻璃廠，並建造道路與橋樑⁷¹。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雙方簽定的協定，中共又提供一億圖格里克的低利貸款，由外蒙以貨品自一九六二年起分年償還。一九六〇年五月，在中俄共關係剛要惡化時，周恩來與陳毅訪問烏蘭巴托，又提供兩億圖格里克的貸款給外蒙，協助其第三個五年計劃（自一九六一至六五年）內工業，灌

溉及公共事業的建設⁽⁷²⁾。

在文化方面，中共也十分重視對外蒙的文化交流，各種文藝、藝術、科學的代表團，來往頻頻，外蒙也將中國作家的著作譯成蒙文出版⁽⁷³⁾。蒙古的知識份子普遍對中共抱有好感，烏蘭巴托的大學生，有些希望到中國大陸留學，蒙共中也產生親中共傾向的派系，被一次次整肅所壓抑的民族情緒，又漸漸透露了出來。這正是五十年代期間中共大力爭取外蒙的高潮。

此外，從另一件事上也可見到中共對外蒙古的影響力。外蒙再度加速推行集體化的工作，是一九五八年，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將合作社合併。一九五八年外蒙有農牧業合作社七二七個，第二年就併為三八九個⁽⁷⁴⁾。使得合作社的範圍幾乎合於一個蘇木的轄區。因此，外蒙決定廢除蘇木以下的行政單位——巴嘎，而將蘇木與合作社結合起來。經過一番調整，使三七〇個蘇木和三八九個合作社，重新編組成四二六個蘇木合作社⁽⁷⁵⁾。這可能是仿倣中共在內蒙古自治區的作法，因為中共在一九五九年把內蒙三、二〇〇個畜牧合作社合併為一五〇個畜牧公社，一個公社的範圍就與一個蘇木的範圍相同。

甚至中共與外蒙關於共同使用內外蒙牧場，都達成了協議，允許風雪交侵的

寒冬，外蒙牧者可移牧到內蒙。一九五七年四月，外蒙在呼和浩特正式設領事館⑦⑥，有助於內外蒙的直接聯繫。這一切都標幟着五十年代間，雙方的關係長足的進展。

史大林的死，給俄共和中共、赫魯雪夫和毛澤東，都帶來深遠的影響，由思想上的分歧，利害的衝突，終於發展成全世界共產革命領導之爭，兩個共產國家也公然反目成仇。

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召開代表大會，赫魯雪夫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他的外交方面和平共存的政策⑦⑦。會中並要與南斯拉夫共黨改善關係，批判史大林並譴責它搞個人崇拜。當時中共只對清算史大林的激烈方式，作了相當的保留⑦⑧。稍後爆發了波蘭和匈牙利的抗暴運動，柏林危機，使中共對蘇俄的和平共存外交政策，開始懷疑。

一九五九年八月，蘇俄成功的試射洲際彈道飛彈，十月，試放人造衛星成功。毛澤東眼見東西方力量有了決定性的變化，公開主張社會主義不怕核子戰爭⑦⑨，希望蘇聯改採強硬態度。但赫魯雪夫不為所動，依舊堅持其和平共存的路線。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針對和平共存路線，揭出「不斷的革命」論點，同時正式發

動「大躍進」，設立「人民公社」，在內政方面也越趨激烈。

同時這年八月，中共發動大規模炮轟金門，企圖奪取台灣^⑧，蘇俄則實踐其和平共存政策，謀擴展與美國的關係，不肯給與援手。一九五九年六月，蘇俄更撕毀與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十月所簽的協定，不將原子彈樣品及製造技術提供給中共^⑧。同年秋，中印邊界發生衝突，蘇俄為拉攏印度，未聲援中共，反宣布中立^⑧。上述事件，更激怒中共對俄共的新仇舊怨，雙方的決裂，演變至此祇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外蒙介於中共與蘇俄之間，中俄共關係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到外蒙。由於中共在外蒙的影響力日增，蘇俄遂不得不竭力爭取外蒙，以穩住這個地位益見重要的衛星國。一九五七年五月布加寧率團訪問外蒙，十五日與澤登巴爾發表聯合聲明，在這份聲明中，宣稱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九年蘇聯贈貸給外蒙的援助款，已達九億盧布。蘇聯並將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三年計劃中，貸給外蒙兩億盧布。此外，蘇聯並將「蒙古石油公司」、「蘇蒙金屬公司」的股權，無條件讓渡與外蒙。同時又宣布，在外蒙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將繼續提供六億一千五百萬盧布的貸款^⑧。

由蘇俄宣布貸款的時間與數目來看，完全是針對中共對外蒙提供貸款所作的反應行動。蘇俄要用經濟援助，阻止中共勢力在外蒙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之前，中俄共在外蒙的關係，還有合作的性質存在，在布加寧澤登巴爾聯合聲明發表以後，二者關係已經完全轉為競爭。

中共在外蒙影響力的迅速進展，蒙人的民族情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外蒙領導階層中部份有力人士的心態，也十分重要。自喬巴山死後，丹巴 D. Damba 就和澤登巴爾展開領導權之爭。一九五二年五月澤登巴爾出任總理，一九五四年四月，丹巴就取代澤登巴爾擔任蒙共的第一書記。在這一段期間，正是中共在外蒙最活躍的時代。丹巴雖不一定是親中共的，但在他掌權時期（一九五四、四——九五八、十一）對中共勢力的發展確是有助。因為丹巴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不甘處處受蘇俄控制，引進中共勢力將可抵制。這也是多數蒙人共同的想法，這種心態是值得注意的⁽⁸⁴⁾。

丹巴是不肯完全遵從蘇俄的，與他有同樣心理的在黨政領導階層中，不乏其人，下述交涉，可作此種測斷的注腳。一九五八年夏，蘇聯逼迫外蒙割讓緊鄰唐努圖哇的一塊土地，在那裡發現新的礦區。外蒙副總理兼外長阿瓦傑德 Avazhed

提出抗議。但立即被強制撤銷，阿瓦傑德也被解除外長職務，但他仍保留住副總理⁽⁸⁵⁾。

外蒙要尋求獨立自主，是蘇俄所絕不容許的。於是兩次的整肅展開，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澤登巴爾由丹巴手中奪回了第一書記的職務。丹巴仍擔任第二書記。一九五九年三月再進行第二次整肅，丹巴被逐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連帶書記處、政治局、政府各部會人員都有誅連。外蒙政府的人事，也因此有所調整⁽⁸⁶⁾。中俄共關係變化後，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〇年初，中共宣布蒙文改用拉丁字母拼寫，不採用俄文字母，避免蘇聯對內蒙的影響⁽⁸⁷⁾。同年五月周恩來和陳毅訪烏蘭巴托，提供兩億圖格里克的新貸款，也只是延緩外蒙一面倒往蘇俄的速度。蘇俄勢力再次在外蒙的加強，外蒙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就更受到壓抑和挫折。

(四) 中俄共交惡後外蒙的因應

中俄共間的爭執，自一九六〇年起，日益明顯。四月，中共藉著紀念列寧九十週年誕辰，在「紅旗」雜誌上刊出「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揭開對俄共和平共存修正路線的批判⁽⁸⁸⁾。六月，羅馬尼亞共黨舉行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中俄共都派

有代表參加。會中赫魯雪夫指名攻擊毛澤東，說他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完全不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儼然又是一個史大林，並且完全不瞭解真正的國際情勢。中共代表彭真也發言反駁，於是雙方首次公開攻擊對方⁸⁹。

七月，蘇俄突然撤走了派在大陸的大量專家和技術人員，並且帶走設計藍圖，留下許多未完成的計劃。俄共或想藉此迫使中共屈服，但結果却加深了中共的敵意⁹⁰。

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二屆世界共黨大會，共有八十一個共黨組織參加，中共也由劉少奇率團前往。這次會議本含化解中、俄共歧見的作用，雙方也有妥協之意，但在會議席上，却各堅持己見，毫不相讓，演變成宣揚己方論點，爭取其他共黨支持之爭。會中雖然只阿爾巴尼亞共黨公開支持中共，但在其他亞洲共黨中，似亦不乏對中共表示同情⁹¹。這次會議發表的宣言，蘇俄佔了優勢，中共本來拒絕簽字，經過幕後折衷，仍是簽字了。事後中俄共對這份宣言的解釋並不相同，雙方強調的重點，也全不一致。

次年（一九六一）十月，蘇共召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避開中共，對阿爾巴尼亞激烈攻擊，是年十二月並宣布與後者斷絕外交關係。相反地中共

却一再強調與阿爾巴尼亞的友誼和對其支持^⑩。

此後中俄共的歧見日漸加深，爭論的層次也日漸升高，雙方雖然也曾試圖改善關係，但觀點的對立和利害的衝突，使彼此的爭端，更由兩個共黨之間，擴大到兩個政府。於是中、俄共的交惡演變到對立，遂成為舉世注意的大事，俄共在共產世界的領導權，遭到第一次的挑戰。

在中俄共關係逐漸惡化情況下，外蒙對中共的態度自不免受到影響。開頭外蒙想儘量降低影響的層面，繼續與中共發展關係。而中共既與俄共對壘，自然也要籠絡外蒙，至少要外蒙暫時保住中立。至於俄共，它已恢復在外蒙的優勢，當然不允這優勢再受到中共的威脅，何況外蒙是俄共對付中共的一項重要籌碼，因此對外蒙的問題處理起來也格外小心。外蒙對中共的因應，就在三者這微妙的心態下繼續發展。

前曾述及一九六〇年五月周恩來等的訪問烏蘭巴托，據云曾提出提供三〇萬名華工的建議，遭到外蒙的拒絕^⑪。但外蒙畢竟缺乏勞動力，翌年，仍有華工進入外蒙。是年三月外蒙代表團並赴北京磋商繼續供應華工之事，稍後又有幾批赴外蒙工作。同時，許多由華工完成的建物，也陸續移交給外蒙當局^⑫。

從蒙共第二書記曾德 C. L. Tsende 這年十二月與紐約時報記者薩利斯勃

Harrison E. Salisbury 的談話中，也可看出外蒙仍希望和中共維持正常關係，繼續從中、俄共雙方獲取援助⁹⁵。可是這項左右逢源的希望，並不易實現。由於俄國的施加壓力，外蒙勢須表明態度，一九六二年五月起，外蒙就有遣還華工的事發生，似可視為徵兆。中共原以提供勞工協助外蒙，討好外蒙，並對外蒙伸張其勢力，自不會冒然撤回。大量華工的離境，對勞力原已不足的經濟發展，必受到嚴重傷害，外蒙亦應不會主動。促使遣還華工的，自是出於蘇俄。

中共為挽救這種情勢的演變，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外蒙簽定「邊界條約」，在有爭端的地區，都作了相當的讓步⁹⁶，似也含有爭取外蒙好感之意。可是預期的效果並未如願。定約以後不滿兩星期，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澤登巴爾在一次會議上，指名攻擊中共是教條主義和冒進主義，完全重複蘇共真理報上的指摘說詞。這等於表明了在中俄共衝突之中，蒙共支持俄共的立場。這年三月，中共也根據澤登巴爾這番言論，首次反擊外蒙在中俄爭執中採取親俄共的立場⁹⁷。

外蒙態度上的支持俄共，被蘇俄控制和能提供更多經濟援助外，在外交方面協助其打開封閉的困境，擴展了對外關係，滿足外蒙一部份尋求自主的意願，也

該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因為外蒙切望多與世界聯繫，尤其是自由世界，這將是外蒙爭取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國家的有效策略。一九六一與一九六二年，經由俄共的幫助，終於獲得顯著的進展。第一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加入了聯合國^⑧，第二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參加了共產國家間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簡稱經互會 CMEA) ^⑨。

成為聯合國和經互會的成員，對外蒙自然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進入聯合國，是外蒙對外關係的大突破，具有多方面深遠的意義。從外蒙代表正式踏進這個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機構，增加了與非共產國家的接觸，並因此獲得與許多國家建交。「經互會」雖是由蘇俄主持的共產國家組織，但外蒙則是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外蒙從此可從東歐國家得到更多的經濟援助，尤其在貿易和科技兩方面。蘇俄此一策略的運用，是對外蒙忠心効順的獎勵，也是隔離中共和外蒙接近的手段。外蒙和東歐集團經濟上進一步結合，也有助於蘇俄對外蒙的經濟控制。

民族主義情操，在中共和外蒙關係上一直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共經常運用來困擾蘇俄和外蒙的關係。一九六二年值成吉斯汗誕生八百週年，這年六月二十一日就成為中共展開攻勢的時機。

中共先兩個星期，就在成吉思汗的陵寢前，舉行盛大的集會，參加的人數多達三萬名。紀念會完全按照蒙古傳統的祭儀進行。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並在紀念會上讚揚成吉思汗的偉大成就。會後又舉行五天（六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學術會議，對成吉思汗的功業和歷史地位，重新評價^⑩。

外蒙官方的紀念會，是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也在會前兩個星期，先由外蒙科學院院士達姆丁蘇倫 T. S. Damdinsuren 在第三屆作家會議席上，指責學校教育不重視歷史課程，忽略成吉思汗的重要性。紀念會的當天，由蒙古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學術會議，除蒙古學人與文化界人士外，並邀有外籍學者參加。由蒙古著名史學家納措多爾濟 S. H. Natsogdorji 在會中報告，盛讚成吉思汗在政治、軍事和組織方面的才能。並推崇採用畏吾爾字母製作蒙文，對蒙古文化發展有重大貢獻。而製定大雅薩 The Great Yasha 法典，更是文化的成就。基於這紀念會的倡議，於是外蒙政府決定，在成吉思汗出生地——肯特省的迭里溫勃勒答黑 Delum Boldog 建造一座高三六呎的紀念碑，並發行紀念郵票，以為紀念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的獻禮^⑪。

可是這一活動，很快就有了轉變，蘇俄展開尖刻的批評。俄共絕不容蒙人的

民族意識，受紀念成吉思汗的鼓舞，何況當時正鞭史大林屍貶喬巴山的熱潮，也不願有個人崇拜式的紀念成吉思汗活動。外蒙當局立刻進行整肅，所有倡導和參與這次紀念會的人，都成了待罪之身。領導這活動的吐莫奧其爾 Tomor-Ochir，身為蒙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九月就遭到整肅。蒙共烏嫩報（烏嫩 Uen 意即真理）指責奧其爾進行反黨陰謀，藉紀念成吉思汗鼓吹民族主義。成吉思汗除了在統一蒙古部族，建立蒙古國這一事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外，後來的行動，完全是反動的。納措多爾濟和達姆丁蘇倫，都被迫作了自我批判^⑩。

外蒙第二號人物曾德，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也遭到整肅。被解除政治局委員，第二書記，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大呼拉爾主席等職務。他被控的罪名之一，也是支持民族主義。他可能是為了想取代澤登巴爾，才遭到整肅，在奪權的進行中，他配合外蒙民族主義高漲的情勢，反對完全親俄的路線。他也反對遣退華工，認為必將有損於外蒙經濟。被罷黜一切職務，應是權力鬥爭落敗的結果^⑪。

一九六三年五月底，外蒙經濟代表團到達北京，討論中共對外蒙經濟和技術援助事宜，停留了一個星期，却沒有獲得任何結果，也未能訂結新的經濟協定。這年九月起，就又有大批華工被遣返，留在外蒙的華工人數已顯著的減少^⑫，蘇俄

。其二，同年五月，外蒙忽擴大舉行哈勒欣河戰後二十五週年紀念，並樹立巨大的戰勝紀念碑，這似乎含有警告中共之意⁽¹⁰⁸⁾。其三，這年六月，外蒙公開了上年底第五次中央委員會的一項決議案，這是有關國際共產運動中蒙共的立場，嚴厲的對中共加以批評，完全倒在蘇俄的一邊⁽¹⁰⁹⁾。

中共為了反擊，八月間就已關閉所有經由中國大陸到外蒙的通道，迫使外蒙必須經西伯利亞維繫俄國以外的貿易。在這之前中共並將集寧到邊界的鐵路，改為標準路軌⁽¹¹⁰⁾，這等於斬斷了三國的聯運，也帶給外蒙的經濟沉重打擊。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遭到罷黜，布里茲涅夫出任俄共的第一書記，柯錫金 A. Kasykin 被任命為部長會議主席。俄共減少了對中共的批評，外蒙與中共間的關係，也顯得稍為平靜⁽¹¹¹⁾。

外蒙對中共關係的明顯惡化，與蘇俄的關係就更加密切。雙方互訪頻繁，而且層次也顯著提高。一九六五年一月，俄共主席團委員謝勒平 A. N. Shelepin 率團前往外蒙，訪問十天，並到過鄰接內蒙的南戈壁省。當地的第一書記，是上年底才被整肅的，原因是鄰接內蒙地區有反俄傾向，同時也反對澤登巴爾的親俄路線和獨裁作風。謝勒平的訪問南戈壁省，或與外蒙內部的紛爭有關⁽¹¹²⁾。

的壓力外，外蒙失望的心理，藉以發洩，也不無關係。

華工赴外蒙幫助各項建設工程，是五十年代，中共與外蒙關係迅速增進的主要原因。「藍色螞蟻」的勤勞形象，曾引起世界的注意，更贏得外蒙的感激。但隨着外蒙與中共關係的變化，留在外蒙的華工，形象也變壞了。一九六三年六月，外蒙首次向中共提出抗議，指責在烏蘭巴托的華工，散發書報，播散中共領導階層對許多重要問題的錯誤觀點⁽¹⁰⁵⁾。

前曾提到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訪北京時，毛澤東曾提及外蒙問題，遭到蘇俄的拒絕討論，一九六四年這事公開了。蘇俄指稱，當時中共企圖併吞外蒙，自然無可討論。這一內幕的揭露，引起外蒙的激烈反應，不但抨擊中共對外蒙有野心，而且痛斥中共是種族主義和擴張主義。毛澤東對日本訪客公開此事，本意可能是想提醒外蒙，認清被蘇俄控制淪為附庸的事實。經過蘇俄的狡賴，竟造成外蒙對中共的仇視⁽¹⁰⁶⁾。

外蒙言辭上激烈的攻擊，中共都儘量容忍，縱使必須駁辯，語氣也較溫和。但累積多次不友善的事實，中共也無法再行忍讓。其一，一九六四年一月，澤登巴爾不顧中共和印度的邊境之爭，致電尼赫魯Nehru，表示對印度立場的支持⁽¹⁰⁷⁾。

同年四月，澤登巴爾率團訪問蘇俄，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都親往機場迎接。訪問期間，代表團的各項活動，都刊登在蘇俄報紙的頭版，俄共也體驗到要如何迎合蒙人的自尊心理。雙方更簽定新的經濟技術協定，蘇俄將在外蒙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六六—一九七〇）中，提供六億六千五百萬盧布的援助。這筆鉅款約當外蒙總投資的三分之一。蘇俄又宣布協助外蒙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築物，並協助訓練大批建築工人，以緩和遣返華工後外蒙勞動力的不足^{⑪③}。

一九六六年一月，布里茲涅夫率團訪問外蒙。一月十五日雙方簽定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這個條約的第五條規定：雙方「將聯合採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包括軍事在內，以確保兩國的安全、獨立及領土的完整」，雙方並簽有「秘密協定書」，正式允許蘇俄的軍隊重新進駐外蒙^{⑪④}。

對外蒙七十年來尋求真正自主自治的努力，這是致命的挫折，蘇俄以中共為假想敵，再度以大軍嚴密的控制了外蒙。

同年六月，蒙共舉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共首次未派代表參加，這事曾被敏感的新聞記者，視為中共退出外蒙的一種迹象^{⑪⑤}。七月，中共仍派代表參加外蒙革命四十五週年慶祝大會^{⑪⑥}，這彷彿表示與外蒙「黨」與「黨」的關係，已不

復存在，「國」與「國」的關係，仍繼續維持。只是這種關係，也相當降低到只是例行性的接觸。

這年八月，中共展開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這本是毛澤東企圖奪回權力和整肅異己而發動的，剛趨平靜的中俄共關係又被震盪，外蒙和中共的關係也更加惡化。對於「文革」，蘇俄是嚴厲的抨擊，認為文革的重點就是反蘇。蒙共跟隨俄共，也尖銳的批評說：「中共領導們所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不但絲毫不能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反而有助於帝國主義者」^{①⑩}。又指責說：「這是以新動力，從事充滿敵意的反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加強反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行為」^{①⑪}。一九六七年的外蒙與中共關係，更進入前所未有的惡劣地步，外蒙對中共的批評更加激烈，據新華社報導：是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九日不滿一月之間，外蒙報刊登載反中共的文章，就超過一百二十篇^{①⑫}，激動的兩方人群，使衝突的事件也隨之大幅升高。

衝突的增加和升高，帶來不斷的外交抗議，也展開激烈的爭論叫罵。但最令中共如芒刺在背的，則是進駐外蒙數以萬計的蘇俄紅軍。據報導俄軍在一九六七年駐紮外蒙的兵力，就超過十萬人，包括一個戰車師，五個機械化步兵師，一萬

名的工兵部隊，防衛烏蘭巴托和東方省的地對空飛彈部隊，以及中程機動飛彈部隊等^⑫。為配合作戰起見，外蒙軍隊的裝備也連帶現代化。在當年十一月慶祝蘇俄國慶五十週年，外蒙舉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大閱兵，展現被蘇俄裝備的火箭、戰車等新武器。駐守外蒙的俄軍，也參加了檢閱。東歐共產國家在參加閱兵典禮後，也展開與外蒙的軍事合作^⑬。

中共為對付外蒙，一九六七年與外蒙未簽定任何貿易或文化協定，八月十八日中共廣播指責外蒙進行反中共活動，無故辭退數千華工，並勒令其返回中國大陸。又指責外蒙一再破壞雙方簽定的經濟技術援助協定，貿易文化等各項協定。九月並警告外蒙，追隨蘇修領導集團，絕沒有好下場^⑭。外蒙和中共，從是年八月北京外蒙使館衝突事件後，都撤回了大使，使外交關係在形式上為之降低^⑮。

一九六八年雙方的關係又稍見緩和，五月間恢復簽訂例行一年一度的互相供應貨物議定書。七月，駐京外蒙使館例行慶祝國慶的酒會，中共相關人員也前往參加。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如此維繫着。但面對進駐外蒙的俄軍源源增加，並在沙漠地區建立飛彈基地，中共也只有在內蒙地區集結兵力，一面鎮壓文革後內蒙激起的反抗力量，一面布署與俄軍對壘^⑯。

在經濟方面，中共對外蒙則展開報復的運作，雖照例簽訂貨物互供議定書，却大幅度減少貨物的數量，對外蒙經過中國大陸運往北越或日本等地的貨物，也儘力予以阻撓⁽¹²⁵⁾。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俄共間爆發了珍寶島事件，這次有限度的局部戰爭，一次在二日，似乎由中共所引發，一次在十五日，則是蘇俄兇狠的報復⁽¹²⁶⁾。中共遭受到沉重的打擊，只有在言論上猛烈反擊。三月十七日首先在人民日報上譴責蘇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的理論，揭穿蘇俄是以「經互會」和「華沙公約」，作為侵略他國的工具。並藉此將外蒙變成蘇俄的殖民地⁽¹²⁷⁾。更進一步指出，蘇俄是以一系列的平等條約，強加於外蒙。除去派大軍駐紮外，所謂「專家」、「顧問」，直接操縱外蒙的黨政軍的大權。新近所簽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更是含有全面的侵略性，使外蒙的內政外交完全從屬於蘇俄的需要。在經濟上假「國際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不准外蒙發展重工業或機器製造業，只許外蒙集中發展畜牧業，這是把外蒙變成蘇俄的牧場⁽¹²⁸⁾。上項攻擊，明顯的有挑撥離間的用意，但也不乏事實作根據，使蘇俄難以辯白。這對蘇俄在共產集團中領導地位的形象，發揮相當的破壞力。

珍寶島事件雖未再繼續或擴大，但外蒙的戰略地位則更形重要，蘇俄對外蒙的連繫，也更需加強。七月，蘇俄更換遠東軍區司令，外蒙也跟着更換國防部長，新任部長是由蘇俄訓練的多爾濟 B. Dorji ⑫⑨。中俄共在宣傳上雖互相抨擊，但也重新察覺到和解仍是必要的。兩個共產國家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亟需有所改善。這年九月，蘇聯總理柯錫金赴河內參加胡志明葬禮後，回程就短暫訪問北京，與周恩來晤面。雙方同意須就領土問題先展開談判，以改善雙方的關係，並同意意識上的爭論，不應影響到國家關係的正常運作⑬⑩。同年十月，中、俄共重新恢復了邊界談判，一九七〇年年底，中斷三年之後，中俄共也重新派出了大使。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在中俄共關係稍有改善後，也隨之改善，彼此攻擊譴責的言論，也有緩和與減少的趨勢。一九七〇年十月，澤登巴爾表示，願與中共重新互派大使，提升雙方的外交關係，一九七一年八月中共新任駐外蒙大使許文益就在烏蘭巴托呈遞到任國書，受林彪墜機事件影響，外蒙新任駐中共大使索蘇爾巴拉姆，在延誤了三個月後，也到北京履新⑬⑪。

雖然珍寶島事件未擴大成戰爭，雙方為緩和情勢也恢復了有關領土問題的談判，但彼此仍無法互相信任，因此從關係惡化後的擴軍活動，即一直進行。蘇俄

布署在遠東地區的兵力，一九六七年有十五師，一九七〇年就增加為三十師，一九七三年夏更昇到四十師^⑬。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在其發表的「一九七一年戰略調查」中指出：自一九六八年以來，蘇俄駐屯在中俄邊界地區以及外蒙古的師級部隊，已達過去的三倍^⑭。至於中共方面，由於武器裝備落後，需以量來補質的不足，駐屯在邊界地區的兵力，就更為龐大。

在中俄共武裝對峙下，外蒙成為蘇俄駐軍的重點，據專家保守的估計，外蒙本身的軍力只有三萬人，而蘇俄屯駐的大軍高達三十萬人，外蒙的邊界實際上成為蘇俄邊界的延長^⑮。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通過接納中共入會的提案，並接替我國原有的常任理事國席位，許多國家紛紛與中共建交。在這種情況下，外蒙也獲其益，因為一個國家與我國斷交，就不再考慮我國對外蒙主權的主張，在它與中共建交以後，也往往與外蒙建交。一九七一年時與外蒙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共五個，一九七二年就增加了四個，這年二月十九日外蒙與日本正式建交^⑯，使得外蒙對外貿易的擴散更廣，對外蒙未來的經濟開發，應具有重大意義。

中俄共的衝突，是一九六〇年代國際矚目的大事，中共就展開與美國改善關

係的試探，拉攏美國以為己助，才可平衡俄共所加的壓力。這事的進行相當不易和迂迴，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雙方在華沙舉行大使級會談，才逐漸成熟⁽¹³⁶⁾。四月，美國桌球隊應邀赴大陸訪問，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也兩度前往北京洽商，並安排美國總統尼克森 Richard Nixon 的訪問事宜。次年二月，尼克森正式訪問了中國大陸，並簽署了聯合公報⁽¹³⁷⁾。這是中共從俄共大軍包圍危機中的一次突破，但對於一個封閉長達二十多年的共產極權社會，一旦接觸到自由民主世界，必將給中共帶來既多且廣的難題。

從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起中俄共的關係又再惡化，同年夏天雙方邊界談判破裂，莫斯科撤回其談判人員，是一個轉捩點。事實上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突破，可能才是再惡化的真正原因。據云布里茲涅夫曾向中共提議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遭到中共的拒絕⁽¹³⁸⁾。外蒙和中共的關係，也受到中俄共關係惡化的影響⁽¹³⁹⁾。

中俄共間的宣戰攻訐，相對的減少，而外蒙對中共的言論攻擊，則變本加厲，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間，除去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的死，暫時停歇外，外蒙一直猛烈攻訐不斷。指責中共的內容，也十分廣泛：諸如與帝國主義結盟，背棄馬列主義，迫害蒙藏人士，種族擴張主義，大漢族沙文主義，對鄰近國家

具有侵略野心等，儼然是俄共的代言人。其中一九七九年六月，主辦亞洲佛教和平會議，特別邀請西藏抗暴後出走印度的達賴喇嘛，前來烏蘭巴托參加⁽¹⁴⁰⁾。可見外蒙的反中共活動，已開始多角進行。

(五) 中俄共關係解凍中外蒙的矛盾

中共為挽救其內外的危機，減輕蘇俄包圍形勢下軍事威脅的壓力，認為有改善對俄關係的必要。而俄共為維繫共產集團形式上的整體性，減緩中共與美國接近，也有心和中共和解，就在這種情況下，從一九七九年九月，雙方開始了第一回合改善關係的談判⁽¹⁴¹⁾。但是彼此都瞭解，雙方有現實上利害的衝突，有未來發展上的矛盾，這都不易協調。更何況半世紀來中共受俄共的頤指氣使，二十年交惡對抗，鬱積了多少新仇舊恨，解凍後的談判，將是一個漫長的行程，也許談判竟是一個拖延待變的詭譎手段。

對於中共和蘇俄關係的改善，外蒙在心態上有其矛盾之處，一方面希望中俄共能夠和解，如果中、俄共能恢復到一九五〇年代的友好關係，外蒙的軍費負擔可以減輕，勞力缺乏問題可以解決，爭取兩方經濟援助，更是左右逢源。中俄共

勢力的競爭，將更有利於蒙古真正自主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外蒙則擔心在中俄共和解的過程中，外蒙的利益會遭受到損害，被當作犧牲。

外蒙這重顧慮，並非杞人憂天，而有其可能性^⑭。儘管如今事實的發展，外蒙已不再是曩日的外蒙，它與蘇俄的關係由於「直接聯繫」而更加密切，對蘇俄經濟上的利益已明顯增加。外蒙進入聯合國之後，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格外積極。蘇俄似無意放棄這個扶翼已逾半世紀的衛星國家。但為了改善與中共的關係，而犧牲外蒙部份的利益，則並非絕不可能。畢竟在蘇俄的心目中，與中共的關係友善，要比外蒙更為重要。從一九七九年迄今，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就在這種矛盾心理下發展。

外蒙對中共口頭或文字的攻擊，並未因中俄共展開改善關係談判而趨和緩，相反地，由於中俄共關係正常化第一回合談判中，中共要求先決條件之一，就是蘇俄把紅軍撤出外蒙，這個要求對外蒙刺激很深，外蒙對中共的抨擊立即兇猛的展開。

外蒙認為蘇俄在外蒙駐軍，是外蒙得以維持獨立，對抗中共併吞野心的保證^⑮，因此，對中共此一要求嚴加駁斥。外蒙特別強調，俄軍的駐防外蒙，是基於

外蒙的要求，是為了保障外蒙的獨立，對中共的安全並無影響，也不是中共與蘇俄關係正常化的障礙。駐軍一事是外蒙與蘇聯之間的事，根本不該在中共與蘇俄談判中討論⁽¹⁴⁴⁾。外蒙又認為：屬於外蒙的事，應由外蒙自己決定，假若中共希望和内蒙關係正常化，就必須放棄大陸霸權主義，尊重内蒙主權，停止干預内蒙的內政⁽¹⁴⁵⁾。外蒙對中共與蘇俄改善關係，表示支持，但不該損害到第三者的利益。此外，外蒙也表示願在和平共存和睦鄰的原則下，也與中共改善關係⁽¹⁴⁶⁾。這些駁斥中共的論調，究竟是發自外蒙的本意，還是受蘇俄所指使，就無法不令人懷疑。

外蒙不但駁斥中共要求俄軍撤出外蒙的提議，而且要求蘇聯強化蒙軍的戰力，更新外蒙軍隊的裝備。一九八〇年九月，澤登巴爾就聲稱，莫斯科已經接受外蒙的要求，替外蒙軍隊配置最新型武器和裝備，使得蒙軍的火力和機動性都大幅的提高⁽¹⁴⁷⁾。

事實上蘇俄對於中共撤退駐蒙軍隊的條件，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枝兵力，隨時都能給與中共政權致命的一擊。早在一九七四年布里茲涅夫訪問烏蘭巴托時，就指明這是無法接受的。一九八一年五月，蒙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蘇俄代表團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戈巴契夫 M. Gorbachev（即今日蘇俄總書記）率領參加，

戈巴契夫在會上演說，就向外蒙保證，確保盟邦的安全，是蘇聯神聖的責任⁽¹⁴⁸⁾。一九八二年三月，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Tashkent的演說中，也堅決表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將不會對第三國造成傷害⁽¹⁴⁹⁾。這些都可看出蘇俄的基本態度。中共與蘇俄在莫斯科，舉行中斷十多年來雙方第一回合的談判，因不論關係正常化有無獲致進展，會議的本身，就是所謂正常化的開端。雙方原本同意第二年年底，於北京重開會談。但由於當年十二月蘇俄出兵阿富汗，中共藉機中止談判⁽¹⁵⁰⁾。一九八〇年蘇俄也未向中共提議繼續進行。

但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到一九八二年二月的一年之間，蘇俄曾五度建議恢復會談。嗣後且派遣官員前往北京，正式就重開會議提出建議⁽¹⁵¹⁾，也未得到中共立即同意的答復。雙方各懷詭詐，一切的表態，似又與國際現勢的千變萬化有密切的關聯。事實上中共在一九八二年九月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後，就決定加快與蘇俄改善關係的腳步。是年十月雙方在北京恢復副外長級的磋商談判。十一月中共外長黃華赴莫斯科參加布里茲涅夫的喪禮，趁機於莫斯科舉行另一回合的談判。一九八三年起，雙方的貿易額迅速增加，文化、科技和體育的交流活動，也呈現活躍⁽¹⁵²⁾。由於中共和蘇俄改善關係的進展加快，且蘇俄的態度顯然比中共來得積

極，外蒙不免引起疑慮，怕蘇俄為換取中共更大的讓步，不惜犧牲外蒙的利益。外蒙大舉驅逐華人，製造事端，希望藉此延緩蘇俄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進展，也不無可能。熟悉外蒙問題的專家桑德士 Alan Sanders，就判斷外蒙這番舉措，就是給蘇聯一個暗示，提醒蘇聯勿輕易接受中共的要求⁽¹⁵³⁾。但是也有一些人研判，外蒙此項驅逐華人行動，正是蘇俄一手所策劃，至少也經過蘇俄的同意。想藉此向中共答復，蘇俄無權干預第三國的行動。中共不該提出涉及第三國的事務（包括外蒙、阿富汗、越南），以為關係正常化的條件⁽¹⁵⁴⁾。以蘇俄外交手段的狡詐，這些花樣或優於為之。祇是陰狠誦詐的中共也非弱者，蘇俄此種狐搯狐狸的伎倆，中共是否接受，就值得推敲。

中共派遣華工協助外蒙建設，原是五〇年代的事，嗣後受到蘇俄的壓力，多數已陸續遣返。八〇年代仍舊能居留在外蒙的已是少數，這些華工根據原簽協定，早該有長期居留權或外蒙國籍。想不到當初被外蒙當局崇敬感謝的華工，竟淪為外蒙發洩情緒或報復中共的犧牲。在中共蓄意淡化這些事件的情勢下，華工已無法保障它應享的權益和尊敬。

七〇年代間，外蒙曾零星驅逐了幾批人數不多的華工，祇是借題發揮，醜化

中共的形象而已。而一九八三年的驅逐華工，則是大規模，且含有報復性的故意製造事端。先是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至六月一日，外蒙當局先後通知居住在烏蘭巴托的華人二九四戶，總共一、七六四名，限期在接到通知兩星期內，遷往指定的省區農場。稍後即自三月底起，展開將華人成批的驅逐出境。

據外蒙表示：留居外蒙境內的二千五百多名華工中，只有少數人獲有固定的工作，從事有益社會的勞動。而絕大多數的華人，則逃避勞動，有系統的破壞外蒙法律。外蒙現在提供機會，讓他們到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工作，若他們拒絕，則外蒙允許他們返還中國大陸。但中共所宣布的，則與此頗有出入，是年六月三日，並向外蒙提出正式抗議。中共指責外蒙是有計劃的舉措，也是長期歧視華人政策的施行。先強迫華人遷往邊遠地區，拒絕接受命令的華人，就遭到驅逐，並且受到敵視的待遇，遭到外蒙當局的搜查和沒收財產。中共又稱此事已和外蒙進行了十四次交涉，外蒙都置之不理，不得已才提出抗議。並警告外蒙，若不停止這種行動，一切後果，將由外蒙完全負責⁽¹⁵⁵⁾。

外蒙根本拒絕接受中共的抗議，指責抗議的本身，就是中共干預外蒙內政的證明，也將阻礙了外蒙和中共關係的改善⁽¹⁵⁶⁾。

此外，一九八二年九月，達賴喇嘛應邀二度訪問外蒙。訪問期間，達賴強調西藏與外蒙歷史上的密切關係⁽¹⁵⁷⁾，外蒙當局也藉機指責中共在西藏迫害藏人的罪行。這自然仍是醜化中共形象的舉措，同時也含有對蒙人的警惕作用。

雖然外蒙曾多方面故意醜化中共的形象，又大批驅逐滯留外蒙境內的華工，更尖銳不斷的對中共言論攻擊和批評。但是隨着蘇俄有意與中共進行改善關係的談判，外蒙和中共的對陣，也必然的漸趨和緩。一九七九年，中共重新恢復了十年前被大幅縮小的內蒙古自治區⁽¹⁵⁸⁾。一九八一年恢復了蒙古自治區學校內蒙古語文的學習⁽¹⁵⁹⁾。這都是有心對外蒙重塑形象。

一九八二年外蒙新任大使沙格達蘇倫 P. Shagdarasuren 赴北京履新。同年二月十八日起，中共與外蒙即舉行了「邊界檢查委員會」的第一回會議。這委員會是一九六四年雙方簽定「邊界議定書」而設立的，歷經十八年並未舉行過一次會議，如今恢復了它的運作，會議到四月三日結束⁽¹⁶⁰⁾。以後又經過四回會議，於一九八四年七月，由中共副外長韓敘和外蒙第一副外長雲登 D. Youden 在北京簽定了「邊界聯合檢查議定書及附圖」⁽¹⁶¹⁾。

簽字前，中共外長吳學謙曾與雲登交談，吳學謙表示：中共願意和外蒙發展

經濟、貿易、技術和文化各方面的關係。雲登也表示外蒙也願意和中共發展關係，並開展邊境貿易和文化交流⁽¹⁶²⁾。這段交談正反映了雙方在發展關係中仍存有歧見。

同年八月澤登巴爾下台，由巴特孟和Batmönh 替代之⁽¹⁶³⁾，仍是出於蘇俄授意的人事安排。這也許是受蒙古民族主義思想高漲的影響，蘇俄換掉一個已具有親蘇派顯著形象的人，藉以謀求緩和。

外蒙基於物資供應的需要，擴展對外貿易關係，急需經過中國大陸的運輸管道，適度獲得中共提供的勞力，更重要的是引進中共力量，平衡蘇俄的支配壓力，在夾縫中謀求自立自主的可能性。平情而論，外蒙都比中共，更積極盼望改善兩者的關係。

不過可以確定的：中共和外蒙都希望增進彼此的接觸，改善彼此的關係，而外蒙受蘇俄的控制太深，假若蘇俄和中共的關係無法改善，則外蒙和中共關係的改善，也難樂觀。目前中、俄共間歧見仍多，談判是一個漫長的歷程，會談只是和緩緊張的一種手段，缺乏解決實質歧見的真正意義。中俄共間是如此，外蒙和中共之間，雖明知雙方友善，對彼此都有利益，却也無法單獨達成改善關係的心

願。

(六) 結論

外蒙自一九一二年醞釀獨立以來，除受詭詐多變的國際背景影響外，蘊藏在蒙人建國的運動中，別有一股潛在的力量，即是切望能自治自主的意願，要為無可諱言的事實。而此一力量則為民族思潮沖擊下凝聚而成。可惜一九二一年受俄國共黨言甘辭卑的誘惑，在紅軍的援助下再度獨立，表面上雖是自行建國，實質上則已陷入俄共的陷穽之中，逐漸淪為俄國的附庸，難以自拔。半世紀來多少次整肅屠戮，被害者多數是致力蒙古民族運動的志士，骨嶽血淵，犧牲慘重，不能不說是獨立運動中的重大挫折。但今後掙脫俄共所加的鎖枷，重振蒙古族昔日的光輝，仍需蒙古族的民族思想滙聚為洪流，此其一。

俄共入據庫倫以後，初鑒於外蒙地區民智落後，宗教力量十分深厚，乃不得不仍奉庫倫活佛為大汗。一九二四年活佛示寂，始仿照蘇聯模式，制定憲法，重塑政治體系。改國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改黨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改庫倫為「烏蘭巴托」。在俄共史大林的指揮下，利用甘供蘇俄驅使的過激派，展

開一次次的奪權鬥爭。直到一九四〇年，才造成喬巴山的獨裁統治。在這二十年的血腥統治，雖使支配蒙古社會已數百年的兩大勢力——貴族與寺院，澈底摧毀，但付出的代價，則是被俄共所控制，日增月積，淪陷愈深。更因蘇俄大軍的進駐，納外蒙於蘇俄遠東防衛體系之中，實質已被軍事佔領，益無自主之可言。此其二。

一九四五年二月，英美為爭取蘇俄對日參戰，重施強權秘密外交故技，訂立「雅爾達密約」，出賣盟友我國的利益。事後更壓迫我國，與蘇俄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由外蒙舉行公民投票。在俄共導演之下的公民投票，竟全票贊成獨立，我迫於當時國內外情勢，不得不承認此一事實。但蘇俄則自訂約之日起，即一再違反「友好」之精神，百般危害我國權益。我遂提出「控蘇案」於聯合國，得直後，一九五三年二月正式明令廢止此項條約，連帶對外蒙獨立的承認，也再度成為法理上有待爭論的問題，此其三。

中共竊據大陸，與外蒙迅速建立外交關係，並在喬巴山死後，與外蒙訂立為期十年的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極力發展雙方的關係。十年之間進展頗為迅速，中共也打破了蘇俄獨佔的局面。造成這種形勢中共方面有兩個重大條件：一是從

烏蘭巴托到集寧的鐵路，修建完成，一是對外蒙提供大量勞力和金錢的援助。但在外蒙方面，主動引進中共的勢力，發揮制衡蘇俄壟斷和控制，在夾縫中迂迴爭取真正自主的可行性，更是不可忽略的一種力量。中共勢力的進展，激起蘇俄加強對外蒙的援助和投資，造成外蒙經濟的成長，就是這種制衡作用的成效，此其四。

自一九六〇年中俄共交惡以後，基於外蒙地理上的戰略價值，蘇俄更加緊對其控制。外蒙在中俄共兩者之間，終不能不有所選擇，最後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靠攏蘇俄。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亦隨之而惡化。中共力圖挽救無效，其已進入外蒙的勢力，亦被清算芟除，演變到僅保留象徵性國與國間的外交關係。蘇俄為彌補外蒙清除中共勢力的缺望，牽引外蒙進入聯合國，核准外蒙參加經互會，作為獎勵外蒙忠順的措施。其中以進入聯合國特別重要，從此外蒙得與世界大多數民主國家及不結盟國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是外蒙在真正獨立建國的途程上一大突破，恐為蘇俄卵翼外蒙達半個世紀始料所不及，此其五。

自一九七九年迄今，中俄共的關係稍有改善，外蒙與中共關係，也隨之而有進展。但這都只是形式上的，中俄共集結在邊界上的大軍，對壘之勢，一日不變

，兩方面實質上關係的改善，絕難有成。中俄中間斷斷續續所謂「關係正常化」的會談；有意識上的分歧，路線上的爭論，共產集團領導權的爭奪，更重要則是現實上利害的衝突。雙方各懷詭詐，很難達成任何重要的協議。這將是一項耐力競賽的長期談判。也許談判的進行本身就是談判的目的。雙方都有所期待，期待在漫長談判進行中的新變化。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只能隨着中俄共的關係而變化，不論中共如何狡展，外蒙如何渴望與中國增進關係，蘇俄一日不放鬆外蒙，五十年代中共和外蒙親密的局面，恐無法再現，此其六。

① 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朝鮮甲申事變後，朝鮮有派使密乞俄國援助事，俄人勢力伸進半島。英國為防堵計，曾一度佔領控對馬海峽門戶之巨文島 *Posi Hamilton*，一時牽動中英、中俄交涉。即是英國與俄國在北太平洋一次顯著的對抗。日本最忌俄國勢力在半島膨脹，遂竭力慫恿中國對朝鮮實行積極的宗主權政策，此甲午戰爭前中國勢力在朝鮮伸張十年。自俄宣布自一八九二年東西雙向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才迫不及待挑起甲午戰爭，趁鐵路未修通前，在朝鮮半島造成優勢，參閱王信忠「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外交背景」頁九三—九五有關巨文島事件等之分析。

② 俄皇先以聯合法德干涉日本退還遼東，示惠於中國，再藉俄皇加冕為名，邀清廷派李鴻章前往申賀，才以援我對日作戰為由，簽定「中俄密約」，允許以「華俄道勝銀行」投資營建並經營東省鐵路事宜。遂使東省鐵路公司成為侵略中國東三省一切權益之大本營。

③ 此一交涉由日本外相內田康哉訓令其駐俄大使本野一郎，乘機向俄外部提出

交涉，內田並表明個人意見，可以張家口至庫倫大道，作為東西內蒙古之分界，幾經交涉，終決定以北京之經度線為界。內田訓令係一九一二年一月十日發，密約係七月八日簽字，足見日本劍及履及，採取主動。可參閱拙著「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頁六七—六八。

④ 俄人在辛亥年十一月致清外務部照會，即以中國須聲明不在外蒙駐兵，不向外蒙殖民，不干涉外蒙內政，提出交涉。鼎革之後，先經外交總長陸徵祥與俄使交涉，歷時六月，議訂條文六款，又遭國會否決，俄人亦乘機反覆，再經孫寶琦接長外交後續議，終於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簽定中俄聲明文件及另一件。俄人限制中國在外蒙之主權，萬變不離其宗。恰克圖中俄蒙三方會議即據此聲明文件而召開。俄蒙私訂協約中許與俄人商務專條之種種權利，則悉在聲明文件中得到中國中央政府之承認。

⑤ 徐樹錚以武力脅迫外蒙撤治，繼而恩琴以殺戮鎮壓，激起蒙人反抗之心。是時潛伏庫倫之俄共份子，已引進喬巴山及蘇赫巴圖等各自成立一個革命小組，從事反北洋軍閥及白黨活動，後來兩個小組合併即成為蒙共的基本成員。當其第一次成立會時，共出席者二十六人，內有俄及布里雅特各三名，實際

蒙共只二十人而已。

- ⑥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頁一四，烏泰為刑部副大臣，海山為內務部司官，陶什託琥為兵部司官。

- ⑦ 外交部檔案元年六月十日收國務院鈔交黑省來文，庫倫封勝福為統轄呼倫貝爾大臣，世襲貝子，並頒給銀印，其副總管等亦封爵有差。

- ⑧ 俄帝國主義時代之國際關係第十八卷頁二二七載俄外相致代理內閣總理函件云：「我們遠東政策的基礎，就是跟日本簽訂的許多條約：這是我們在遠東的平靜和安寧的主要因素。使這一因素去冒險，不見得是謹慎的」。參閱拙著「外蒙古撤治問題」頁八。

- ⑨ 俄人拒絕外蒙與呼倫貝爾合併的支持，寧願與中國另訂「呼倫貝爾條件八款」（四年十一月六日簽字互換）。

- ⑩ 中俄關係史料（民六—八年）「外蒙古」頁三四三—三四四。
- ⑪ 同前書頁三四七。

- ⑫ 外蒙撤治所議定之善後條例六十三條，蒙人旨在盡力保留自治權力，國防與外交由中央負責。至於「用人」與「軍隊」兩條，在庫倫尚未折衝出一致之

意見，參考拙著「民八外蒙撤治問題癥結的探討」。見中華民國建國史論文集第二冊。

⑬ 陳崇祖書，頁一三（第三編）。

⑭ 茲拉特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一一九，甚至醜化徐樹錚在外蒙的軍事統治謂：所有的通路上都佈置了崗哨，檢查每一個過往行人。當徐氏發出命令時，總是派隊伍一同前去，以保證命令的嚴格執行。

⑮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二五五。（以下簡稱「通史」）。

⑯ 同前書頁二六六。

⑰ 楊汝舟「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二六。

⑱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三)頁一一一五。

⑲ 楊汝舟書頁二九—三〇。

⑳ 「通史」頁二八三。

㉑ 同前，頁二八四。又前引茲拉特金書頁一五四。

㉒ 同前，文中說明「在建立這個機構（內防處）及其活動上，蘇俄對反革命進行鬥爭的經驗，給了很大的影響」。隱約透出蒙古的一切整肅都在俄共及第

三國際指揮上進行。

- ②③ 同前，頁二八五，又茲拉特金書，頁一五四。
- ②④ 同前，頁二八六。
- ②⑤ 同前，頁二八七，又茲拉特金書，頁一五九。
- ②⑥ 同前，又茲拉特金書，頁一六〇。
- ②⑦ 前引茲拉特金書，頁一五六。
- ②⑧ Charles R. Bo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Y. 1968) pp. 192-193. 鉄瑞夫，杜景著（扁舟，若如譯）「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一，頁五三四參考。
- ②⑨ 「通史」頁二八九。
- ③⑩ Barry George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oward China, 1952-1973 (W. Virginia Univ. 1974, Ph.D. Prissertation) p. 74.
- ③⑪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二九二—三。
- ③⑫ 同前頁二九四。自一九二七、二八年間，共青團奉第三國際的命令，參加蒙

古人民革命黨，這兩年間就有四千多團員取得了黨籍，喬巴山奪權成功後，自一九三二年起，共青團也變成黨的輔助機關。

③③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二六四。

③④ 同前頁八一。

③⑤ 同前頁八二。

③⑥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五七五—七。「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三—四。

蘇俄一九二一年入侵外蒙之軍隊，四年後曾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撤出，一九三五年元月，俄軍為防日本關東軍西進，再入駐外蒙。

③⑦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四—五。

③⑧ 同前頁八二—三，茲拉特金書頁一九八則謂：「到一九三一年蘇聯幾乎成了蒙古牲畜和原料的唯一購買者，蒙古所需工業品的唯一供應者」，更可見經濟上的壟斷。

③⑨ 同前頁八四。茲拉特金書頁一九八記述：「一九二九年登記的封建主凡七二九戶，有六六九戶的財產被沒收，每戶只留給一〇〇胡比（每胡比相當三〇土格里克），其餘收歸國有。一九三一年又沒收了八三七戶，內有二〇五戶

是寺院封建主。有七一—戶反抗，被鎮壓後流放到指定的地區」。

④① 同前頁八五。

④② 茲拉特金書頁二〇三—四。

④③ 同前頁二〇四。

④④ 同前頁二〇二。

④⑤ 同前頁二〇〇引述此項資料。

④⑥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五。

④⑦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五引。

④⑧ 茲拉特金書頁二一一，張大軍書(三)頁一三七五。

④⑨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八六。

⑤① 同前頁八七。

⑤② 同前頁八六。

⑤③ 「通史」頁三三六，茲拉特金書頁二六七。

⑤④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二九五。

⑤⑤ 同前頁三七一。

⑤4 在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建交以前，及中共潛入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未清黨之前，蘇俄因別有更大圖謀，對外蒙的控制程度，稍為放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便加緊控制。

⑤5 外交部駐新特派員公署檔案「情報彙編」（民國36年元月份）轉引自張大軍書（四頁一六〇——二）。

⑤6 Robert A.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72. (1964)

⑤7 張遐民編著「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蒙藏委員會出版）頁一二六。

⑤8 Rupen, p272,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下)頁二九四。

⑤9 烏蘭巴托至集寧鐵路得以建造，可能與同時間中共同意蘇聯軍隊繼續留駐旅順有關。參見 David Flayd, Mao Against Khrushchev, (N. Y. Frederick A Praeger) p.215.

⑥0 據張大軍書（四頁一八五三，這鐵路修築時，中共原修標準軌（四呎八吋），後蘇俄以有碍國際聯運，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令中共改用寬軌。

⑥1 Robert A.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N. Y.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268.

- ⑥2 「五年來中蒙經濟合作」見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一〇月四日轉引張大軍書(四)頁一八四四。
- ⑥3 "China is Waging Expansionist Cold War"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16, No. 34, p. 7.
- ⑥4 Ibid, p. 5.
- ⑥5 Robert A.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81. (蒙藏委員會出版之「蒙藏風光」頁七四，輯有此陵寢。)
- ⑥6 Robert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 272.
- ⑥7 Ruben; Russian-Mongol-Chinese Conference, p. 537.
- ⑥8 "Harrison E. Salisbury 著「外蒙簡介」(原載一九五九年八月三—七日紐約時報，國防研究院譯印)頁九。
- ⑥9 協定中規定華工服務期限至少五年，期滿後繼續居留，取得蒙古公民資格，或返回中國，任由勞工自由決定。(參考張大軍書(四)頁一九九五。)
- ⑦0 前引「外蒙簡介」頁一一。

⑦1 引自張大軍書(四)，頁一九八二。

⑦2 外蒙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六二)後因蘇俄堅持改為三年，目的在配合蘇俄的經濟計劃，由一九六一年起進入第三個五年計劃。(見「外蒙共黨之真相」頁三八八)

⑦3 「通史」頁三九二。

⑦4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四〇三。

⑦5 Rupen, Mongolia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295-296.

⑦6 樞原「蒙古人民共和國」頁七五(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⑦7 「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53年)第一冊頁一四、三六。

⑦8 葉伯棠著「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赫魯雪夫時期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台北正中書局民六九年)頁一二。

⑦9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pp.117-118 (New York, 1969)

⑧0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pp.121-122. Cambridge Mass. 1981.

- ⑧ Adam B. Ulan;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N.Y.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623.
- ⑨ David Floyd, Mao Against Khushchev, pp.261-262 (N.Y. 1963)
- ⑩ Ro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291.
- ⑪ Ibid, p.278.
- ⑫ Barry George Bartow; The Policy of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oward China 1952-1973, p.71.
- ⑬ Ibid, pp.69-71.
- ⑭ Robert A.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272.
- ⑮ 「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一冊頁二〇〇—二四二。
- ⑯ Edward Crau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Baltimore 1963), pp.107-109.
- ⑰ Alvin Rubinst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p.122.

⑨1 「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一冊頁二六六—三〇四，並參考「葉伯棠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頁一一〇—一二八。

⑨2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p. 370-383.

⑨3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81.

⑨4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oward China, 1952-1973, p. 92.

⑨5 Interview with Harrison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Dec. 17, 1961 轉引自 Bartow, p. 97.

⑨6 此項條約對雙方爭論的一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讓給外蒙多達一萬二千平方公里。

⑨7 Bartow; The Policy of M.P.R. toward China, 1952-1973 pp. 121-122.

⑨8 外蒙多次申請加入聯合國，均未成功，這次是蘇俄重施整批交易方式，為挾帶外蒙入會的手段，並以否決非洲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入會，脅逼非洲新興國家對我施加壓力，最後我國在安理會上棄權，外蒙才獲得加入，成為

聯合國的會員。

- ②⑧ R.A.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79.
- ②⑨ Ibid, p.99, Paul Hyer; "The Re 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6, No. 12, pp.698-699.
- ③⑩ Charles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p. 418.
並附有照片插圖。
- ③⑪ P. Hyer; The Re-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pp.699-702.
- ③⑫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323.
- ③⑬ Ibid., p.333.
- ③⑭ China News Analysis No.534 (Sept. 25, 1964) p.3 ~~轉~~ ~~引~~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PR Toward China 1952-1973, P.123.
- ③⑮ M.T. Haggard "Mongolia: The Uneasy Buffer" Asian Survey, Vol. 5, No.1 (January 1965) p.20.

- ⑩ Paul F. Langer; Outer Mongolia, North Korea, North Viet-Nan, 145-146. (N.Y. 1965)
- ⑪ F. J. Romance, Sino-Soviet Policies Towards the MPR 1945-1965, p.195.
- ⑫ Ibid., p.195.
- ⑬ 「蒙藏敵情月報」第五期，頁一。
- ⑭ 「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六冊頁一一五參考，又 M.T. Haggard, Mongolia: New Soviet Moves to Bolster Ruling Group, Asian Survey Vol. 6 No. 1, (Jan. 1966) p.13.
- ⑮ Ibid. pp. 14-15.
- ⑯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PR Toward China, 1952-1973, p.142.
- ⑰ 參閱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五)頁二三四——四二。
- ⑱ 「蒙藏敵情月刊」，第二七期頁一。
- ⑲ Robert A.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Slow

- Evolutin", Asian Survey, Vol. 7, No. 1, p. 19.
- ①17 O. B. Borisov and B. T. Koloskov, Soviet-Chinese Relation 1945-1970 (Indiana Univ. Press, 1975), pp. 291-299.
- ①18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6), p. 344.
- ①19 Joe Hart;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Asian Survey (Vol. 8, No. 1), p. 25.
- ①20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五四九。
- ①21 「蒙藏敵情月報」第四六期，頁一，又 Joe Hart; Mongolia 20th years of Economic Planning, p. 27.
- ①22 同前第四二期，頁一。
- ①23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PR Toward China 1952-1973, p. 172.
- ①24 「蒙藏敵情月報」第五九期，頁一一二。
- ①25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六)頁二五六六—七。
- ①26 參考拙著「東北中俄國界東段之研究」頁六二—九。
- ①27 「蒙藏敵情月報」第六十期，頁三，六十四期頁八—十。

⑫⑧ 同上。

⑫⑨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PR Toward China 1952-1973, P. 178.

⑬① A.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P. 128.

⑬① 「蒙藏敵情月報」第八九期，頁五，第九二期，頁一一。

⑬② Military Review Vol.54 No.1, P. 34, 並提到一九七四年一月達到五十師。

⑬③ 「蒙藏敵情月報」第九九期，頁一。

⑬④ 同前第九十期，頁八。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向一群美國訪客談，蘇聯駐在外蒙軍隊有三十萬人，日本估計則只有二十萬人，參見「蒙藏敵情月報」第九五期，頁五。

⑬⑤ 外蒙早有意與日本建交，一九六七年即宣布放棄向日本要求戰事賠償金，至是正式建交，反較中共與日本建交為早。

⑬⑥ J.L. Nogee,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p.232.

- ⑬ Rubinster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p. 129.
- ⑭ 「蒙藏敵情月報」第一〇一期，頁一三、一四。
- ⑮ 同前第一一四期，頁一六。
- ⑯ William R. Heaton, Jr., "Mongolia 1979: Learning From Leading Experience", pp. 81-82.
- ⑰ 見 Chi Su (蘇起)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urrent History, Vol. 83, No. 494, pp. 245-246.
- ⑱ 如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60. 即指明有人一直相信：為了獲取中共的重大讓步，蘇俄有可能把外蒙歸還中共。
- ⑲ Alan Sanders; Revenge of the 'Wee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1 (1982) p. 21.
- ⑳ Alan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bal to Batmonh" Asian Survey, Vol. 25, No. 1 (1985), p. 129.
- ㉑ William R.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Asian Survey

Vol.24, No.1 (1984), p.128.

⑭ Alan Sanders; "Cool Celebratio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16, No.46 (1983) p.46.

⑮ Alan Sanders, More Help from the Kremlin, F.E.E.R. Vol. 110, No. 45 (1980) 但由於一九八二年外蒙國防部長阿伯雅 J. Abhia 的更換，可能強化軍力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

⑯ Alan Sanders; "New Faces at the Top", F.E.E.R. Vol. 112, No.26, (1981), p.11.

⑰ Alan Sanders; "The Sabre Rattling Bear", F.E.E.R. Vol.113, No. 30, (1981) p.16.

⑱ Chi Su "China and Soviet Union", p.245.

⑲ 國防部情報局「匪情年報」(一九八三—一九八四)頁二六六—二六八。
⑳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109.

㉑ Alan Sanders; Cool Celebrations, p.47.

㉒ David Bonavia "On A Firmer Footing" F.E.E.R. Vol. 110 No.34,

P. 15.

- ①54 參考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二五至三五。
- ①55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29.
- ①57 「蒙藏敵情月報」，第一七五—八期，頁一三四至一三八。
- ①58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 284.
- ①59 Ibid. (1982) p. 215.
- ①60 W. R.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Looking Forward But Also Back"
Asian Survey Vol. 23, No. 1, p. 48
- ①61 「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一〇期，頁一一二。
- ①62 同前，Alan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bal to Batmonh,
p. 129.
- ①63 Ibid., p. 122-124 參考郝致誠「偽蒙頭子走馬換將事件剖析」「蒙古現況研究」第一輯，頁二。